

社会发展论

刘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发展论

——

——

社会发展论

刘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发展论/刘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161 - 0067 - 7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发展—发展理论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7764 号

社会发展论 刘敏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四色土图文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7383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 - 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 × 65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人生：简单并快乐着

（代序）

2006年9月16日，在我刚刚年过60周岁的时候，按照干部管理使用惯例，我便离开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岗位。这无疑是我人生路上的重大转折，它既标志着职务工作生涯的结束，也标志着真正平民生活的开始。也就在此时，在我脑海里萌生出了将自己30多年学术生涯及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念头。后来，经过一番思索和准备，终于形成了以《社会发展论》为名的文集。这部文集以研究社会发展为主线，汇集了不同时期研究不同领域社会发展问题的26篇论文，占我发表文章总数的不到1/4。因而，它只是一部小书，与一些名家的文集不同，既不智慧，也不经典，更不想为后世留下什么财富，充其量只是我简单学术经历的追寻，或者是我快乐工作和人生的一部分记忆。但是，这一思考、整理和编纂的过程，却勾起了我对人生的甜美回忆和深度品味。

人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人生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金钱财富的话，那么还有没有比金钱财富更贵重的东西？我的人生感悟是有，那就是快乐。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和留下各色各样的记忆，有明亮的、灰暗的，快乐的、痛苦的，瞬间的、永久的，但对人生持快乐态度的人，连黑暗都阳光，不快乐

的人连阳光也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简单并快乐的人。

一 从山里娃到大学生

1946年农历五月初八，我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县（今安定区）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当时，爷爷、奶奶都健在，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在县中学读书。据爷爷讲，我们的先人因逃水患，从四川来到此地，经过数代人的艰辛付出，到他这辈时我家家道殷实，吃穿有余（土改时划为小土地经营）。但到1949年，家里突发变故，正在读书的父亲因参加长跑得了吐血病，由于当时家庭条件的限制，在当年年关前不治而亡。

父亲的去世，犹如支撑房屋的梁柱轰然倒塌，彻底摧垮了全家所有人，也在之后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从爷爷口中得知，按当地习俗，年关前去世的人要先寄放待节后才可出殡。当时有一次，爷爷手拉着3岁多的我，到爸爸躺着的窑洞给油灯添油，我好奇地问爷爷，爸爸为啥躺在这里，他冻不冻？爷爷当时怎样回答我已无从记起，但这成为我一生中最早的记忆。它后来给我带来了什么，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失去父爱的遗憾和男儿当自强的勇气。

我的母亲叫马素贞，一生十分凄苦。她幼年丧父，后随母改嫁到了定西县城。然而，她的母亲两次改嫁都没遇上好人家，最后在我母亲六七岁时病逝，她只好被她二爸收养，19岁时出嫁到我们家，24岁时我父亲去世她就守了寡，一直到现在已87岁。

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把所有赞美母亲的语言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她贤惠善良，坚韧顽强，孝老抚幼，勤俭持家。在父亲去世后的岁月里，她承受着环境逼她改嫁的压力，一方面抚慰着饱受丧子之痛的公婆，一方面抚育着只有三岁多的我和不

到一岁的弟弟，把5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挑在自己柔弱的肩上，为了我们家，为了我和弟弟，她牺牲了青春，默默地奉献了一生。我不到7岁上了小学，母亲的艰辛成了我求学的动力和勇气，初小毕业时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县城的大城小学。从这时起，每当开学前，母亲和全家人都要为我的学费发愁。当时，家里能变卖成钱的只有每天眼巴巴等鸡下的几颗鸡蛋，砍伐本来就不多的树木和农作物秸秆。更何况爷爷年迈，母亲又是小脚，因而只能靠我和弟弟到20里外的县城去卖，一角一分地去攒钱。进入初中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在全国普遍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地处黄土高原山区农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记得1960年年初，还能吃上野草籽和杂粮混磨的炒面，到下半年只能吃谷糠、麦麸皮和草籽的炒面了。到1961年连炒面都没有了，只能吃野菜揉成的菜团子。那时，除了苜蓿草、苦苦菜外，灰条、玉米秆、榆树皮、柳树叶和秸秆做的代食品等我都吃过，而且这还是母亲一口一口省下来给我吃的。在那段年月里，尽管如此，但一切都很简单，书照样念，歌照样唱，篮球照样打。多年来，我一直纳闷，那时我的胃口和免疫功能怎么那么好？什么都能吃得下去，什么吃了都不得病。更纳闷的是，那时那么苦为什么烦恼、不怨恨、不退缩，而且很快乐、很坚持、很执著。硬是靠啃菜团子上完了初中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定西地区重点高中。

在读高中期间，因定西中学属地区管理，我的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从此我吃上了国家供应粮，有了助学金。我珍惜这些条件，更加奋发学习，成为班上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好学生。高一就被选为团支部委员，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种活动。我的文科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因为喜欢讨论和辩论，被同学戏称为“哲爷”。这时，我的兴趣和爱好也很广泛，既喜欢习字画画，又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田径篮球。我的画经常贴满宿舍四壁，我

主演的歌舞曾获定西地区文艺汇演第二名，在体育赛场上我又是拿奖的常客。如果说初中三年苦中有乐的话，高中三年我是快乐的。

虽然，高中时期我的生活条件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别人相比我的家境仍然不好，生活非常艰辛，这也直接影响了之后我对理想的追求和选择。1965 年高中毕业前夕，校领导和班主任都劝我报考北大等名牌大学，为学校争得名誉。可我思考再三，断然拒绝了领导的严词批评，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唯一一个志愿甘肃师大（今西北师大）。理由是师大离家近、花路费少，吃饭不要钱，还有助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夺权把高考成绩公诸于世（在此之前高考成绩是保密的），由此得知我的成绩上了重点线后，也曾有过一丝遗憾。但 25 年后我的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使我的遗憾得到了补偿。

1965 年 9 月初，我如愿进入了甘肃师范大学政教系，由一个山里娃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当时，山区农村出一个大学生是很荣光的，临行前几天，亲朋、邻里纷纷登门祝贺，一些至亲还伸出援助之手，你 5 毛，他 1 元，一位姑父给了 2.5 元是最多的，总共凑了 17.5 元。我就是怀揣着这些钱，兴致勃勃地踏入当时觉得似“天堂”般的师大校园的。大学生活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因而既是快乐的又是痛苦的。说其简单是因为既然是学生就应该学习，学习没有什么复杂的，加之我视“学海无涯苦作舟”为“乐作舟”，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 1 年，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别的事都不大在乎，在学习中尽情地享受着快乐。

说其复杂是因为上大学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仅打乱了教学秩序，而且搞乱了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目标追求，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打砸抢烧杀的地步，彻底毁掉了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那时，一会儿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一会儿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会儿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全中国除了伟大领袖，谁都有可能在第二天早上被打倒。我们学生也被搞得不得安宁，一会儿要写批判文章，一会儿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一会儿要参加劳动改造，一会儿又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似乎我们这些新中国培养的青年学生都变“修”（修正主义）了。5年大学生生活里除“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和后来一年多的“复课”学了点东西外，其余时间都是在狂躁和混乱中消磨的，真可谓是酸甜苦辣加遗憾的“五味”人生，至今令人不堪回首。本来大学生活是很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变得复杂起来。人，一复杂就痛苦，其结果是整了老一代，害了下一代，误了我们这一代，党痛苦、国痛苦、人民痛苦、我们也痛苦。

二 从行政工作到理论研究

1970年9月，我同所有大学生一样迟分配一年，又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下，被分配到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永昌县分队朱王堡公社小队头沟生产大队。一年后，省农宣队撤销，我又在培养接班人的旗号下被留到当地当公社干部。

由于我出生在农村，因而对公社工作轻车熟路。1972年，公社党委决定所有干部承包一个生产大队，要求什么时候实现粮食亩产上“纲要”（即亩产达到400斤），才能回公社，由此我又来到农宣队时驻过的头沟大队。该大队与武威隔河相望，全是水浇地，自然条件较好。那时正是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我同大队班子商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当年全大队9个生产队的小麦种子，全部由上年的土品种换为“阿勃”和“甘麦8号”等优良品种；二是每亩

种子量由原来的 25 斤增加到 40 斤；三是每亩除原施的农家肥外，增加 15 斤磷肥为底肥。

当时，当地农民仍沿袭传统的农作方式，对推广良种、化肥和合理密植阻力很大。有的偷种土品种，有的弃化肥不用，因而我组织大队所有干部坚守在春耕地头，监督三项措施的全面落实。谁知，就这三项在当时并不民主的措施，竟然使当年小麦亩产由上年的 237 斤增长到 415 斤，一年就上了“纲要”。这一成绩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仅赢得了公社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认同，而且我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县上。

1972 年年底，我被公社任命为团委副书记、教育干事，主要抓学校工作。永昌人酷爱教育，当地的朱王堡中学聚集着一批年少有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和水平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我征得公社党委书记的同意后，在该校召开了整顿教学秩序大会，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两个小时的报告，并宣布本学期末恢复考试，进行班级评比、教师评优、学生排名次（当时学校不排名、不考试）。这一举措后来也被县上知道，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亲临公社视察。起初，我心里直打鼓，不知是福是祸。后来，在公社书记汇报途中又叫我去汇报后，心里踏实了一些。一进场，书记就抓住我的手紧握不放，说：你胆子真大，干得好，秦书记（指县委书记）让我告诉公社要好好的培养你。

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有了转机。1973 年年初我实现了追求多年的入党愿望。接着，县委同公社协商要调我去县委工作。在公社婉拒之后，于 5 月调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了三个月。9 月学习结束以后县委组织部直接分配我到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不再回公社。

到县委办公室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为年底召开的全县四千会（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撰写工作报告。经过几番讨

论、修改后的报告长达两万字，在会上作报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县委封副书记。他用地道的陕西腔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会后反应热烈，上下赞许有加。封书记会后一见到我便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写得好，读起来美的很！

正是由于我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视。随即我就成为县委书记的秘书，县委常委会议记录人员。到1975年被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

在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上，我一直干到1979年。期间，除了日常大量的文秘工作和管理工作外，我参与了永昌县被国务院树立为全省唯一的“农业学大寨县”的材料准备、审核、上报和新闻宣传工作；同县委书记一起在西坡大队蹲过半年点；以组长身份带领5位干部在八坝大队进行过路线教育；参与了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滥砍滥伐调查，以及设立金昌市的可行性调查和首次向省委的汇报工作。由于上述工作的成绩尤其是较突出的文秘工作能力，我又被甘肃省委办公厅和秘书处的领导所看中，先后在1976年和1978年两次下调令调我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但均被县委谢绝。1979年年初，省委为了筹建政策研究室从基层选人，我又被相中。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加之小平同志鼓励“专业对口”，县上再无理由阻拦。于是，我于3月初离开了工作10年的“第二故乡”永昌县，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报到后因爱人工作安排遇到困难，我找到当时筹建不久的甘肃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他听了我们夫妇的情况后，同意接受我们二人到研究所工作。从此，我的人生又有了一次重大转折，由基层行政工作转向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回顾在县乡从事行政工作的10年，我吃过两年多的百家饭，同农民一起深翻地，用手推车运肥，大半夜扛着铁锨浇水，春种

时撒化肥，夏收时割小麦，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记得 1972 年的夏收共 15 天我参加了 12 天，满手都是血泡。到县上后，别的不说，光我写的材料整理归档的就有 1 米多高。但那时从没觉得苦，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这些都是我该干的。究其原因，就是那时人还是简单。一般情况下，人穷的时候简单，富有了就复杂；落魄时简单，得势了复杂。但我从来就没认为自己富有过，也没觉得得过势，因而复杂不起来。还是那句话，人，一简单就快乐。

三 从研究人员到研究员

从 1979 年年初进入省社会科学院至今 32 年的时间里，我逐渐走上了一条从学、治学以及后来参与治所、治院的艰辛而又快乐之路，为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为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既倾注了大量心血，又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也享受着付出后的喜悦。

刚到社会科学院时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人复杂了、事复杂了、关系复杂了，但我依然极力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一个研究人员的本分一切从头学起、做起。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学习研究政治学起步的，三年里发表了以《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为代表作的 11 篇论文，为后来的研究先练了练手。

1983 年，我转入社会学领域的小城镇研究。1984 年赴京参加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讲的社会调查和小城镇研究讲习班，到 1985 年年底在《中国城乡建设》等刊物上，发表研究小城镇地位、作用、发展战略、东西部比较等内容文章 10 多篇，成为甘肃和西北最早系统研究小城镇的学者。

1985 年是我学术生涯中变化比较大的一年。当年 9 月，我成为社会学法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为了改变以往研究人员各自

为战、所无主方向的状况，确定农村社会学和民族社会学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个人也把研究方向转移到这两个学科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来。也从这一年开始，我的学术研究有了较大进步。至今令人难忘和感到快乐的大概有这样5个“第一”：

一是1986年我主持的《甘肃省农村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调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小农观念的调查与思考”，在当时省委双周理论座谈会上发言后，得到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光明日报》当年8月4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甘肃日报》专发了评论员文章。该文又在国家权威刊物《社会学研究》上公开发表。一篇社会学的调研成果引起媒体和高层的如此重视，这在甘肃社科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例。

二是1986年当选为甘肃唯一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组评审委员，在全国200多名委员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委员。

三是1992年由于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由中级职称直接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研究员。

四是1999年作为学科带头人与西北师大合作，申报设立了当时西部地区第一个社会学硕士点，至今已培养出近200名高级社会学人才。

五是2005年当选为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是中西部地区当选的唯一的副会长，也是甘肃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

在研究岗位上快乐最多的事，莫过于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成果。在3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共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国内外合作项目8项，省级项目16项。出版专著和合著20余部。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百余篇，其中在国外和国际会议发表论文5篇。有11项成果先后获得省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社科理论研究是一项探索社会未知的创造性劳动，既要特别关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又要非常注重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

在《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中，我概括提出了“开发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及其体系，被学界称之为西部社会学人的觉醒，为 20 世纪末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知识准备和理论呼应。在《中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征及其转型》（《社会学研究》1994 年 1 月）一文中，概括提出了 4 种社会转型趋向，即：差别发展中临界点趋近趋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向，连片滚动发展趋向，单质突破发展趋向。其中“城乡一体化”发展概念在 10 多年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以采用。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一文中，构建了从理论层次到实践层次，再到技术层次的“三层次理论体系”。在《山村社会》（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一书中，概括提出了“二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以及黄土高原山区生态再造的“基础转型、区域减压、单元增力”对策。2002 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我著文提出了“低代价开发”的观点，后又经过数年的调查研究，使其理论框架和内容不断完善。2008 年，在《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及其战略调整》一文中，我提出了“民族关系是特殊的社会关系”的观点，同年，《新华文摘》第 14 期全文进行了转载。

在漫长而快乐的从学治学路上，我曾得到社会学界前辈、师长和同人的关爱和教诲。受毕可生先生的启蒙和引路，我有幸进入社会学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多次同老一辈社会家费孝通教授同堂开会，聆听他的教诲。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先生更是亲自听取我研究毒品问题的汇报，为我主编的《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一书题写“发动全民禁毒，提高民族素质”的题词。王康教授长期关心着甘肃社会学的发展，曾任我们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多次为我的著作撰写序言予以鼓励。陆学艺、郑杭生是比较年轻的著名社会学家，我同他们在国家社科基金会共事近 20 年，他们不仅对我个人在各方面给予指导和教诲，而且对甘肃

乃至西北社会学界在申报项目、设立硕士点等重大问题上，长期给予关注、指导和支持。还有一批和我差不多同龄和小一些的学界同人和朋友，如赵子祥、谷迎春、潘永康、卢汉龙、谢寿光、李培林、宋林飞、王思斌、李强、蔡禾等，都曾给予我和甘肃社会学界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如此等等，是我人生中极其宝贵的财富，为我的学术生涯增添了不少智慧和力量。

30多年来，在处事上我是一个随缘的人，保持一种平常、平实、平衡的平民心态。崇尚孟子“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古训，追求一种低调的“自知”境界。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固执人，认死理，相信自己。一直信守着作为儿子必须孝敬父母，作为丈夫必须关爱妻子，作为父亲必须抚育儿女等，这些生活中理应遵循的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因为工作，减少、推卸和放弃过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是努力去把它做好。我不赞同业界一些同人昼伏夜劳的工作方式，也不认同不顾家庭的所谓事业型的“大男子”和“女强人”，我的所有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白天“八小时”内完成的。也可能正是这种固执，才使我少了许多缺憾，而平添了许多快乐。

我今年65岁，还不是太老，但回头看人生，不免有一些感悟。谁都知道，人，一简单就快乐，可快乐的人并不是很多；一复杂就痛苦，但自找苦吃的却俯拾即是。这反映了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即人在生活中究竟该追求什么？我的感悟是在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里，要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具体而言，就是谋事不谋人，包容不排斥，记情不记仇，知足不苛求。要学会在追求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和忙碌的人生中寻找快乐，创造快乐，抓住快乐，储存快乐，享受快乐，把事业和快乐一同进行到底。我也期盼我自己在今后的生活中依然简单并快乐着。

值《社会发展论》完稿付印之际，用以上的自言自语自勉，是为序。

目 录

我的人生：简单并快乐着（代序）	（1）
-----------------------	-----

第一篇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走向及其特征	（3）
-----------------------	-----

一 经典社会发展理论	（4）
二 发展理论	（7）
三 协调发展理论	（10）
四 以人的永续需要为中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	（13）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	（16）
-------------------------	------

一 宏观层次——社会发展理论的构架及支点	（16）
二 中观层次——社会发展模式和战略	（21）
三 微观层次——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	（24）

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	（27）
------------------	------

“人的全面发展”的定位与内涵	（36）
----------------------	------

一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 低纲领的契合点	（36）
二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社会发展的 转折点	（37）

2 社会发展论

- 三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思想的着眼点 (38)

第二篇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初探	(43)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过程	(43)
二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	(45)
三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传承和本土化再造 ...	(50)
试论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及其特点	(54)
一 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理论支点	(54)
二 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实践模式	(59)
三 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特点	(63)
论邓小平的协调发展思想	(66)
一 邓小平协调发展思想的缘起和形成过程	(66)
二 邓小平协调发展思想的内涵和理论体系	(73)
三 邓小平协调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特色	(76)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社会发展的保证	(80)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三大关系”的和谐	(84)
一 人际关系的和谐	(84)
二 人群关系的和谐	(85)
三 人地关系的和谐	(86)

第三篇 农村和区域社会发展研究

从发展战略看中国社会第一问题	(91)
一 绝非臆构的“第一问题”	(91)
二 “第一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92)